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 阶段划分与规模度量

杜恂诚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是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使中国被迫成为西方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西方国家并不希望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因此不仅不予帮助,反而阻碍中国产业自成体系。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和广大职工抓住了两大历史机遇,即棉纺织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新型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与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扣,近代中国经济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规模度量,不能像度量西方国家经济那样只关注工业,而更应关注进出口行业、与城市化相关的各种行业,还应深入研究近代中国进出口行业和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中国近代经济 经济发展模式 进出口行业 工业化

作者 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中国经济史,一般以研究具体问题的居多,从能找到的研究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原始信件、会议记录、营业报告、新闻报道等着手,寻找史迹,发现规律。过去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强调写文章要有理论,要有思想。学生常会问,怎样才能把经济学或历史学的理论用进去?所谓理论,应该是所研究问题特定的规律揭示,而特定的规律揭示才是我们需要寻找的特定的独一无二的理论发现。西方已有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其他学科,主要是对西方社会的规律总结,但它们是否适合中国或者部分适合中国,是需要论证的。我们引用西方的部分理论,表示受其启发,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特殊规律,而不是以西方的规律来替代中国的规律,以西方的理论来替代中国的特殊理论。

理论有大有小,整体问题有整体理论,具体问题可以有具体理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所谓整体性理论,就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特定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等作出阐释和论述。纲举目张,只有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等整体性的宏观理论,才能对各个具体问题看得更为清晰。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落后,不只是工业发展水平低,更在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为一些强权国家所掌控,而这些国家的政客和大资本所有者在所谓“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利用充斥着所谓促进“和平、和睦、通商”漂亮辞藻的不平

等条约^①,将中国经济引向它们所需要的发展方向。为此,近代中国不仅丧失了大量政治和经济的权益,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工业、提升经济。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在今天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理念,这与经济全球化应该构成相辅相成的战略。本文尝试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勾勒一个浓缩的框架,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和规模度量提出一点探讨性的意见,供大家批评。

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模式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通过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夺利益,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更有甚者,西方列强通过政治和军事强权,控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方向,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适合它们需要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西方列强要把近代中国塑造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而不是帮助近代中国发展成为类似于它们那样的工业国。虽然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也有先后之分,最早成为经济强国的英国对西方其他国家也形成冲击,但那些受冲击的西方国家大多在经历过一二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经历过思想、宗教、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变革后,已经普遍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对科学技术已形成敬畏并愿意随时接受最新的成果。因而,西方的后发国家在受到英国等国的冲击后,能够迅速在国内发起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甚至超过英国等先发国家。^②但是,这条规律绝对不适合近代中国及其他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长期研究马来西亚和西非地区经济的彼得·鲍尔认为,欠发达国家“其本身不可能提供自己所需的资本。总体落后、经济不能做出快速反应,以及缺乏创业精神几乎是欠发达世界的普遍现象”。^③近代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前,并没有长期社会转型的经历和准备,陡然受到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是不可能成为像德国那样迅速崛起的后发国家。日本的情况有点特殊,它受到冲击后崛起得比较快。然而,日本在遭受冲击前已经有一定的社会转型准备,受冲击后又顺利实现了明治维新这一资本主义改革的目标,但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近代中国虽然落后,但具有许多潜在的要素和市场的优势条件。

中国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中国的丝和茶是备受西方各国欢迎的出口产品,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曾长期占有主要地位。后来,由于别国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中国的丝、茶出口减少,但其他土特产品出口增加,如大豆和豆饼、桐油、蛋品、猪鬃等。中国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据1936年的资料称,当时探明的中国煤矿储藏量为2482.9亿吨,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煤产量却十分有限,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一直徘徊在年产量2000多万吨的水平,1931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也才2882万吨。^④而且,当时中国的好煤矿,即高产、优质、近交通线的煤矿,多为外国人所侵占,如日本人侵占了辽宁抚顺煤矿、英国人骗占了河北开平煤矿等。中国每年煤炭的出口量大于进口量。^⑤全面抗战前,中国的铁矿生产主要集中在辽宁、安徽、湖北等地,年产量约289万吨,其中日本侵占和控制的辽宁省所产铁矿石占到55%,产品供日本的昭和制钢所及本溪湖煤铁公司,其他

^① 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凤译,刘海岩审校:《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② W. W. 罗斯托著,陈春良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6—677页。

^③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588—589页。

^④ 程尚林:《经济建设中的中国矿业》,《商业月报》第16卷第9期,1936年9月,第3页。

^⑤ 杨德惠:《中国煤矿业现状》(下),《商业月报》第16卷第4期,1936年4月,第15页。

沿江各地所产铁矿石大部分也输往日本,而中国本国所用铁矿石每年仅六七万吨,约占矿产总量的3%。^① 中国还是世界重要的钨矿生产国,“每年产量,常占世界总产量半数以上”。^② “赣湘粤三省之交,钨矿出产,近数十年本已为世界钨产之重心”,江西产量最高,“年产达十余万担”。^③ 中国的钨矿砂也全部运销国外。中国还是世界锑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年产锑1万多吨,锑产品也全部出口。^④ 中国还有较丰富的锰矿资源,锰是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因中国当时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不发达,所以锰矿产品也基本上外销。^⑤ 此外,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还有锡、汞、铜、磷、铅等多种矿产。限于当时的开采能力,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将已初步探明但一时无力开采的矿区划定为“国有矿业保留区”,实业部的矿业行政计划称:“本部除将山东铝矿保留外,对于江西钨矿,亦于上年增划保留区数处,本年度拟再将湖南、江西、广东之钨锰两矿,以及四川、河南之重要钾盐矿,江苏之磷矿,分别划区保留,并确定整个开发计划,以重矿利。”^⑥

中国市场广大,潜力无穷。中国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经济发展及人口的衣食住行构成巨大的市场或潜在市场。这不仅为外人所垂涎,中国的企业家也懂得加以充分利用。棉纺织业和卷烟业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是植棉大国,每年有大量棉花出口。但中国产棉花纤维较短,不适合作高支棉纱的原料,因此在华的外商和华商棉纺织厂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长纤维的美棉及其他外国棉。后来,国内也开始试种美棉品种,1933年各省计有美棉试验场10处。^⑦ 棉纺织业逐步实现了进口替代,但外商仍然占有中国的棉纺织业市场。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中国棉货和棉纱的进口从1920年的高价值约2.56亿海关两降至1931年的约1.11亿海关两,虽下降了56.6%,但进口量仍然很可观。第二,棉货和棉纱的进口值虽然减少了,但棉花的进口值却大幅增加,从1913年的300多万海关两飙升到1931年的1.79亿海关两,1931年共进口了465万担外棉,其中绝大部分是美棉。^⑧ 从进口总值看,1920年进口棉货、棉纱、棉花三项共2.74亿海关两,而1931年在棉纺织工业实现大幅度进口替代的情况下,进口的棉货、棉纱、棉花三项总计却达2.9亿海关两,比1920年多出0.16亿海关两。也就是说,进口替代改变的只是进口商品的结构,而进口总值不减反增,对于外商来说,中国的棉业市场更大了。第三,在华外商棉纺织工厂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份额。

表1 1929—1932年全国纱厂用棉分类占比(%)

年份	中国棉	美棉	印度棉	埃及棉	其他
1929	68.25	13.66	17.99	0.04	0.06
1930	63.11	13.60	22.76	0.21	0.32
1931	49.67	26.43	23.29	0.43	0.18
1932	52.13	38.58	8.81	0.45	0.03

资料来源:朱仙舫:《吾国纺织今后所需原棉之质与量》,中国纺织学会编《纺织年刊》,1933年,第7页。

① 《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室1945年编印,第99页。

② 《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第120页。

③ 《中国矿业纪要》(第四次),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2年编印,第360页。

④ 《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第150—151页。

⑤ 《中国矿业纪要》(第七次),第115页。

⑥ 《实业部矿业行政计划(1934年度)》,《实业公报》第218—219期合刊,1935年3月23日,“特载”,第4页。

⑦ 司马洛因译:《中国棉花之品质及其生产状态》,《商业月报》第13卷第11期,1933年11月,第5页。

⑧ 朱仙舫:《吾国纺织今后所需原棉之质与量》,中国纺织学会编:《纺织年刊》,1933年,第8—9页。

卷烟是近代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新的消费品。当时中国每年大量进口纸烟和烟叶,纸烟的进口在1921年达到高峰,其进口值占当时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2.8%。^①1922年前后,中国进口纸烟的数量每年达81亿支,其中50亿支是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与长江沿岸地区消费的。^②烟叶的进口在1931年达到高峰,其进口值占当年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4%。^③中国种植引进烟叶的土地面积,到1922年约500万亩,年产烟叶约900万担,其中出口约40万担,其余供给设在中国的卷烟工厂。^④中国的卷烟工厂也得到发展,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开设卷烟厂,之后中国的南洋兄弟、华成等烟草公司也相继成立,到1931年仅上海一地,中外卷烟厂的产值就达1.2亿元。^⑤

中国劳动力供给极其充分,中国劳动者具有勤奋、好学上进等优良潜质,能够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外国学者将1910年前后中国和英美纺织业劳动力效率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高低悬殊,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决定的,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差,因而效率低,而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又决定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⑥该学者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劳动力效率的比较,其方法是很不科学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有一个过程。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棉纺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低的。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随着中国纺织企业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改善、技术人员的增加、职工培训的开展,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⑦

西方国家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首先就会掌控并竭力扩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鸦片战争前,1830—1833年中外贸易总额约1344万两白银^⑧,若折成后来的海关两,数目更小。1865年中外贸易突破1亿海关两,1888年突破2亿海关两,1895年突破3亿海关两,以后一路飙升,1917年突破10亿海关两,1928年突破20亿海关两。^⑨从五口通商前中外贸易仅1000余万海关两,到后来几亿、十几亿、二十几亿海关两,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个增长速度还是不能算慢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已被逐步纳入世界经济的大体系,而且,这是一种依附性的纳入。西方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即依照经济发展自身固有规律逐渐构建起来的经济。它们可以将中国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各种基础设施及材料、能源产品等卖给中国,但不希望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成体系的工业及交通、通讯等事业。而且,它们对中国政府的借款常附有必须购买相关国家的工业产品的前提条件,并以建立偿债基金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大大压缩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空间。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西方国家尽可能地把自已的困难转嫁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并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收入囊中。1873—1896年英国遭遇国内经济萧条,大力增加对华出口,并在商业服务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② 晓钟:《中国烟草与制烟工厂》(三续),《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10号,1922年10月,“调查”,第11页。

③ 《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95页。

④ 晓钟:《中国烟草与制烟工厂》(续前),《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9号,1922年9月,“调查”,第5页。

⑤ 《上海华商卷烟工业之现状》,《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调查”,第87—88页。

⑥ 格里高利·克拉克著,李淑萍译:《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327页。

⑦ 参阅杜恂诚:“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⑧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⑨ 郑友揆著,程麟荪译,蒋学楨、汪熙校:《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附录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7页。

领域加强投资。^① 美国国内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打击托拉斯组织,美孚等寡头企业就加强了在中国的销售活动。^② 西方国家在中国修建铁路,或借款给中国政府修建铁路,是为了更多更快地运销商品及进行人员流动。建造铁路是西方国家发展钢铁业的最重要契机,但西方国家并不打算在中国投资建造钢铁厂,或帮助中国建造钢铁厂,它们只是把自己国内的钢铁产品输出到中国,作为投资或借款的前提条件。^③ 另外,铁路的管理改革是引发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主要切入点和抓手,但西方国家通过投资或借款控制中国的铁路公司后,铁路公司并未成为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改革的标杆。^④

20 世纪中期,长期研究拉丁美洲经济的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认为:“我对拉美国家形势的诊断是基于我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批判,我认为这种模式无法使这些国家获得充分的发展。我提出的发展政策旨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有可能克服前一种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⑤ 对于这一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领域的钟天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先驱,以及中国的民族商业群体在普雷维什之前大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觉悟到,并且有人已经付诸实施。在机器棉纺织工业兴起之前,这类努力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业方面。当时中国以丝、茶为出口大宗。自 1874 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动力厂继昌隆缫丝厂,到 1894 年广东的蒸汽动力缫丝厂增加到 75 家。这些工厂由华侨商人、丝商和银号主投资。在上海,1882 年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蒸汽动力公和永缫丝厂,到 1894 年上海共成立 8 家民族资本蒸汽动力缫丝厂,资本总额 206.1 万两,丝车 2576 部,年产丝 2782 担,雇工约 5850 人。之后,又有瑞纶、永泰、久成等丝厂先后设立。^⑥ 此外,江浙等省也创立了机器缫丝厂。这些工厂的产品逐渐代替过去的手工丝出口。在机器制茶方面,1913 年前在福州、温州、汉口、湖北羊楼桐、四川雅安等地已有 10 家资本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制茶厂,其中能够确定资本额的 6 家制茶厂的资本额总计为 178.3 万元。^⑦ 其他如制蛋、制革等出口加工工业中,均能见到中国投资人的努力结晶。

中国的工业投资者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就是基于经济发展自身固有规律的发展。机器纺织业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结构松懈并渐渐瓦解,农民逐渐放弃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家庭纺织业,转而从事收入较高的其他副业,部分农民进城做工。纺织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催生了机器动力产业的发展,先有蒸汽机的问世,后有电力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机器制造业、染料等化工行业的发展。动力产业的发展则催生了轮船、铁路等新型交通工具和新兴交通运输业的产生,机器制造业、铁路等行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钢铁等金属冶炼业的勃兴;而城市化的进展又给各种公用事业、通讯业、建筑业等提供了发展的舞台。大家在说到经济发展方向或经济成长规律时,一般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但对近代中国而言,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以自主性为前提的,如果缺乏自主性,在强大的外力左右下,经济发展自身规律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示。

① 戴维·E·麦克纳博著,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繁荣的进程:全球工商业通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0 页。

②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张逸人等译:《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0—76 页。

③ 戴维·E·麦克纳博:《繁荣的进程:全球工商业通史》上卷,第 67—68 页。

④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13—215 页。

⑤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 618 页。

⑥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3、118、140—141、188—196 页。

⑦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6—397 页。

尽管西方国家要把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塑造成西方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企业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工人在效率方面的进步,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对西方国家所希望塑造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偏离,亦可以说是一种经过顽强抗争后的部分修正。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家是具有伟大民族智慧的,在近代他们紧紧抓住了棉纺织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新式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化潮流两大历史机遇,使发展民族工业的阻力有所减小。在这两个历史机遇中,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努力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交叉而暂时共存。因为按照西方国家想要塑造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它们也是要搞棉纺织品的进口替代和城市化的。

在洋纱和洋布输入中国数十年后,英、美、日等国的投资者认为,在中国设立棉纺织工厂直接制造,似乎更为有利,因为中国的人工和原料都相对便宜,在中国设厂可以省掉运费、保险费、代理费等开支。而中国政府也认为,棉纺织品关乎国计民生,应自行设厂制造。在政治上的障碍被清除之后,棉纺织工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和规模最大的进口替代产业。日本对在华设立纺织厂极为重视,而中国商人的民间设厂也非常踊跃。棉纺织工业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大产业。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产生的辐射效应,又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即便这样的发展极为有限。在棉纺织工业之外,则是食品制造业,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二大产业。根据刘大钧等人1933年工业调查的结果,纺织业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额中占41.0%,在全部产值中占43.4%;而食品工业居第二,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额中占16.8%,在全部产值中占32.5%。^①食品工业发展的契机就是城市化。近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即使是在外人主导下要把中国纳入主要适合外人需要的模式,也逃不过城市化的发展。人们从农村移居到与新式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城市,必然会扩大种种生活需求,这对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是巨大的促进;同时,水、电、煤等各种基础工业,以及建筑业、房地产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由于存在棉纺织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区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化两大历史机遇,中国近代经济并未完全沿着西方列强期望的路径发展,中国本国企业有外人始料未及的表现和进步。但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这两方面,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占主导地位,即使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也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从属模式。尽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自身就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阻力之一,但从维护其统治的立场出发,它们也试图调整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主从模式。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是想用政府直接投资的办法来学习外商,并与外商争利。但军用工业的失败,不仅缘于传统的体制障碍和人材的匮乏,而且缘于相关多种重工业门类基础工业的匮乏;而民用工业的投资又受到体制和财政的种种掣肘,难以得偿所愿。于是,清末新政只能转变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南京国民政府则通过编制经济计划,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在企业投资和基础投资等方面试图有所作为。据统计,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新设工、矿、交运企业(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共98家,创办资本额达到约1.26亿元,是同期中国全部企业创办资本的33.2%。特别是1935—1937年,官营企业的创办资本额达到8297万元,是这三年中国全部企业总资本14694.1万元的56.5%。可见,从1935年起,从新设工、矿、交运企业的投资环节看,国家资本主义已占主导地位。加上铁路、公路、水利、通讯、金融、地方建设投资等,从低估计,1928—1937年国民政府的经济投资总额达到9.16亿元;同时,经济结构也有向重化工业发展的初步势头。^②

^① 根据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1页“附表”的数据重新计算。

^② 杜恂诚:《1928—1937年中国的新设企业与政府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73—174、165—169页。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在沦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经济的影响。西方国家在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会千方百计地嫁祸于中国。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棉布、棉纱、煤油、卷烟等商品,又从中国进口丝、茶等农产品和各种手工业品,这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农村经济。尽管有一个充满抗拒的过程以及后来的进口替代,但中国耕织结合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慢慢地瓦解了。农民不用自己纺纱,可以买到现成的机制纱,后来也不用自己织布,而可以买到现成的机制布。他们还可以用进口的煤油点灯,并以卷烟代替以往的水烟、旱烟。但他们需要从事新的农业生产或新的副业,才能有机会获得必要的货币收入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在农村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新的生产机会与中国的出口贸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合适的地区,人们种桑养蚕、栽种茶树,可以获得比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收获。而一些新的出口农副业产品也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同时,在以新式经济为背景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周边区域的农民可以更多地从事城市居民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如养猪、捕鱼、种菜以及各种手工日用品的制作和贩卖等,也有一部分农民直接进城当了工人。但在这样的农业经济模式下,外商通过收购环节,掌控了出口农副产品及为进口替代需要而种植的棉花、烟叶等农产品的收购价和收购数量。在外商的压榨和本国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盘剥下,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即使从事出口农业的收入略高于种粮,但衣被等过去自产的生活品,现在需要花钱购买。尤其是外商会根据他们在国际市场的利益需要,调整从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品种、比重和他们本国的进口税率,给中国农民造成灾难性的打击。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农业,提高了茶叶、花生、大豆、蛋制品等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进口税,造成中国这些产品出口量大幅下降;还有不少西方国家禁止中国的农副产品进入它们的国家。^①更有甚者,西方国家还通过向中国倾销农产品来缓解它们本国的农业危机。如危机期间,外国的大米、棉花、洋麦、面粉在中国市场低价倾销,造成上海的米价常低于每担15元的中国农民生产成本线以下。^②同时,由于城市工商业境遇萧条,非但农民无法进城谋生,而且城市的失业工人返流乡村,使中国农村的困境雪上加霜。

总之,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与欧美日模式不同,也与其他落后国家不同,或不完全一样,而有其特定的演变路径。近代中国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都受西方国家操控,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并承受西方国家转嫁的风险和灾难。

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或称分期问题,在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中,少数人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应以1840年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但多数人主张应至1949年。其中,主张中国近代经济史应以1840年起、1949年止的学者又有两类意见。

一类意见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阶段性作基本线索,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分两个阶段:1840—1919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形成和进一步加深阶段,1919—1949年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缔造、产生、发展、取得彻底胜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日趋没落、最后全面崩溃阶段。第二种主张分三个阶段:1840—1895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阶

^①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② 张志澄:《米价跌落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动向》,《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2页。

段,1895—1927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阶段,1927—1949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阶段。第三种主张分四个阶段:1840—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形成阶段,1864—1895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完全形成阶段,1895—1927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一步加深阶段,1927—1949年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统治阶段。其所以把1864年也作为划段界标,是由于在1864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还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而1864年以后自然经济解体了。

另一类意见是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作基本线索,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分三个阶段:1840—1895年、1895—1927年、1927—1949年。理由是: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改以资本输出为主,这个转变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1927年以后,一方面蒋介石反动集团把民族资本的发展推上更加残破的境地,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开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已开始产生新的经济体系。第二种主张分四个阶段:1840—1870年、1870—1911年、1911—1937年、1937—1949年。理由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外国对中国没有投资;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开始对中国投资;1911年以后,外国对中国大批投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发展起来;1937年以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发展起来。^①

实际上,上述第一类意见中的第二种主张和第二类意见中的第一种主张在具体的分期上是相同的。以后,此类正面的讨论少了,在几种高水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通史的编写中,主编们采取了他们各自认为合适的分期方法。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1920年为分期,将中国近代经济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两大阶段。该书编者在第二卷第一章导论中说:“我们认为:经济史的任何分期法,都不免带有随意性;根据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我们不去强调分期的原则意义,而是便宜行事,遵从习惯。预计写1840—1949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需150万字,势必分成两卷;若采用近代史习用的以五四运动为界,则两卷篇幅大体可以平衡;这就是理由。因而,我们以1920年作为本卷下限,并名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以便独立发行。”^②这样的解释是非常中肯的,“便宜行事,遵从习惯”,确实反映了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各取立场的心态。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一卷是从1840年到1894年,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则从1895年到1927年,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三卷从1927年到1937年,如果以后补齐第四卷,自然会从1937年写到1949年。丁日初将上海近代经济史划分为1843—1894年、1895—1927年和1928—1949年三大阶段^③,并主编了《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3—1894年)和第二卷(1895—1927年)。

这些分期都有各自的道理,都是可以成立的。分期带有主观性,也不应有绝对的标准。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再提供一种分期的思路,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认知。笔者以为,应根据近代中国经济演变本身的规律来分期,这种规律既包括西方列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对中国经济的操控所造成的结果,也包括中国人民、中国实业家努力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后者尽管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产物,但也与列强单方面的图谋不尽一致。这一分期法是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

^① 孙金铎:《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3—954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③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初。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把中国纳入由它们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英国打败后,先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规定中国关税“值百抽五”;规定英国有领事裁判权;规定英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可以租地建屋,永久居住等。随后,美国和法国分别同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外英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全部特权。其他西方国家也都先后援例同清政府缔约,取得了不平等的在华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外,开放汉口、南京、天津等11处为通商口岸;规定外国船只享有中国内河航行权;确定一次性子口税制度,子口税税率为2.5%。这样,列强一步步深入地获取在华不平等特权,构建了对华贸易的制度体系。

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初至1911年。这一阶段中外双方激烈博弈,西方对中国强化控制,而中国则谋求自强。洋务运动时期,博弈的双方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清末新政时期,博弈双方则是中国企业家与西方列强。

西方列强从19世纪70年代起继续扩大和深化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这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一是交通和通讯方式的革命性进步,二是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欧亚间的航线,轮船代替帆船以及轮船本身的改进,缩短了航行时间且增加了载货量,这些对国际贸易都是巨大的促进。特别是电报的发明,极大地加速了訊息的传递,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之一。这使英、法、德、美等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定价能力大大加强,被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称作所谓的“核心国”。西方列强,包括后起的日本,对于争夺国外市场都是不遗余力,它们谁也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力中落于人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中国市场,攫取掠夺中国的权益。《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制造业工厂。由于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丧失的权益越来越多,中国市场越来越被西方列强所操控。近代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进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腐败颓废的清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是非常不希望完全受控于西方列强的。他们渴望自强,希望握有对外关系的主动权。在经济领域,他们渴望迅速改变完全受制于外人的落后局面,因而有洋务运动的发动。清政府先是投资军事工业,继而创办民用工矿、航运企业,试图与列强博弈争锋,但都未能成功。他们并未认识到,自强对一个国家而言,必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或革命)和转型,而不单单是几杆枪、几门炮、几条船所能决定大局。洋务运动的意义在于清政府通过这样的尝试最终改变了经济政策,即从政府投资、政府控制转变为鼓励民间投资、民间自由经营。这也是清末新政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内涵。新政在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效果,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工人对发展本国经济做出了贡献。在这轮博弈中,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强权地位虽然得到加强,但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工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三阶段:1912—1931年。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进口替代的棉纺织工业与新型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英美两国棉纺织工业的投资人很早就有在华设厂的意愿,甲午战争后又率先在上海设厂,因为在中国设厂制造,可以节约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且产品更便于销售。但这时英美两国都不再是以棉纺织工业作为本国工业发展主导产业,只有后起的日本,棉纺织工业仍是其国内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所以日本成为这一阶段在华外国棉纺织工业的主要投资国。同时,华商在这一阶段对棉纺织工业也有大量投资。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的集聚和增长带来了衣、食、住、行一系列的消费需求,多层次的消费

品有从国外进口的,也有在本地设厂制造的。在这个过程中,华商企业也多有设立。其中有的创办人曾在外商企业做买办或在生意中长期与外商企业有交集,熟知外商企业的设立和运作模式,能聘用到合适的人才,于是自己也创办类似的企业;有的曾留学西洋,或能聘到留学归国的技术管理人才,于是自己创办企业;有的是因外商寡头企业刻意追求高利润,给中国企业留出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创办企业(如卷烟业)^①;有的是与外商企业配套而行,成为外商企业不可或缺的补充(如营造业);有的是为外商修轮船、修机器,慢慢扩大了业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一度减弱,北洋军阀政府则困于财政,无力对经济金融实施全面控制,这些为华商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1931年和1936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年,1931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1936年则更多地带有政府统制的色彩。^②

第四阶段:1932—1937年。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西方国家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千方百计地把本国的危机转嫁出去,特别是转嫁给像中国这样的抵抗力很弱的落后国家。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造成白银汇率大幅上升,外国对华销售商品变得容易,而中国出口变难。同时,英美等国祭起高关税的“防御武器”,来限制他国商品进口,保护本国工业。中国的商品出口被大大限制。若统一以海关两为核算单位,1927—1931年中国出口净值47.3亿海关两,而1932—1936年中国出口净值20.5亿海关两^③,后5年仅为前5年的43.3%。这期间又因美国大量收购白银而导致中国白银巨量流出。这一切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震荡、大困境,农村经济凋敝,大量原本直接出口或加工出口的农产品无人问津,时人称农村经济“破产”;工业企业因订单减少,流动资金链断裂而大量倒闭;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商业、金融业掀起破产清算潮。中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完全是拜西方国家所赐。因为中国作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本身是不会产生在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才会出现的一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如果没有西方国家转嫁的那些问题,中国不可能陷于这样的困局。把这一阶段单独列出来加以强调,可以更加看清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支配和操控。

这一阶段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抗争是渡过困境最基础的保证。中国的工商业组织纷纷自发调节供需,防范市场更大的波动;工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国民政府增加了政府投资,强制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并于1935年实施了法币改革。国民政府的经济措施在短期内虽然收到一定效果的,但从长期看,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经济的从属和依赖,如法币改革还是依赖英美,以后在财政和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格局。

第五阶段:1937—1949年。这一阶段的大背景是战争。各国的战时经济有雷同之处,即政府巨额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民营经济萎缩、食品和日常消费品匮乏等。上海租界经济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呈现所谓“孤岛繁荣”,其原因除了人口和资金的集聚外,还在于能够继续依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进口商品。1939年上海“孤岛”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一半左右,外棉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④此外,还有粮食和煤炭。^⑤太平洋战争前,法币的通胀率相对较低,则取

① 参阅杜恂诚《新的消费习惯催生巨大市场——简论近代中国的卷烟工业》,《学术研究》2022年第5期。

② 参阅杜恂诚《市场的定义与1933年GDP测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③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附录二”,第337页。

④ 《九月份上海外棉的进口统计》,《经济丛报》第1卷合订册,1939年6—12月,第23页。

⑤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4页。

决于英美对维持法币对英镑和美元汇率的平准基金的投入。即使是在全面抗战时期,英美对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资源的大肆掠夺。全面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美国货在华倾销。战后,美国为了独占中国市场,与国民政府签定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实质上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各种优惠权利。^① 中国对美国国门大开,美国人在中国经商,可以比中国人获得更多的便利,缴更少的税。美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强烈冲击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大量生产国货的工厂倒闭。同时,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较前更加依赖美国,抗战胜利后至1948年6月,国民政府实际动用的美国借款和美国物资援助共计42.6亿美元,是全面抗战时期15.5亿美元的2.75倍。^②

三、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度量

规模度量就是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某几个时点的经济发展水平作量的估算。这种估算应尽量做到有依据,且其依据公开透明,经得起质疑,以求估算的结果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不仅同其总量相关,而且同其结构相关。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紧密关联,在度量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规模时,特别要注意经济结构问题,不能把当时的中国想象成西方列强那样的经济独立国家,认为不过只是工业水平低一点而已。根据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特征,在工业和商业的比重上,应该是商业大于工业;而在工业内部的结构比例上,应该是轻工业大于重工业。在这样的认识下,再来考虑以往学界规模度量的合理性问题。

陈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所收集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资料是很有价值的。如根据吴承明发表在《经济周报》第9卷第8、9期上的文章《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1936年中国人投入新式工业资本为法币22亿元,外国在华工业资本折合法币35亿元,总共57亿元,平均每个中国人分得的工业资本不到5元(引者按:这应该未包括外国投资,若加上外国投资,人口按5亿计算,则人均应为11.4元)。而那一年美国人均工业资本约合1600元。^③ 1936年一般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年,也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年,但即便是在高峰年,中国人均工业资本也少得可怜,可见中国工业的进展是极为有限的。该书有大量关于近代中国工业结构、企业数量、企业有机构成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从多方面证明中国工业发展的落后。该书还收集了很多大城市工业资本同商业资本的比较数据,如1929年的汉口:工商业资本合计47742千元,其中工业资本仅占27.4%,而商业资本占到72.6%;1933年的南京:工商业资本合计19917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37.6%,商业资本占62.4%;1933年的上海:工商业资本合计179028千元,其中工业公司注册资本占33.2%,商业公司注册资本占66.8%;1935年的北平市:工商业资本合计43097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5.6%,商业资本占94.4%;1936年的河南郑州、开封、许昌等8个城市:工商业资本合计8382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5.6%,商业资本占94.4%;1942年的重庆:工商业资本总额6810000余千元,其中商业资本占73%,工业资本占26%,矿业资本占1%;1936年除日本外的外国在上海的投资:工商业资本合计达1348272千元,其中工业投资占24.9%,进出口业投资占75.1%;1936年英、美、法、日、德、意、比、挪各国对天津的投资:工商业资本合计62521千元,其中工业资本占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29—1449页。

②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③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2—53页。

33%,进出口业投资占67%;1938年日本在华投资:工商业资本合计1044640千日元,其中工矿业投资占67.2%,商业投资占32.8%。^①

从工商业比较的统计数据看,无论是外国在华投资(日本除外),还是各大城市的存量资本结构,都是进出口业和商业占了很大优势,工业相对薄弱。日本的情况是例外,日本在华大量投资棉纺织工业,又出于侵华国策的需要,在中国进行铁路和其他各种工业的投资,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投资重化工业的数额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计量测算时,往往只在强调中国近代经济的结构畸形时,才会论及进出口业和商业,但深入的、基于一手资料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也不大受重视,受重视的大多是工矿企业,特别是中国民族企业。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三卷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的新式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内涵作了界定和量化。在该项统计中,总产值由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三大类构成;农业全部归属传统产业,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则分成新式和传统两大部分。1920年新式工业产值约9.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8.19%,新式交通运输业产值约3.08亿元,占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50.47%;而1936年新式工业产值提升至31.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2.46%,新式交通运输业产值为8.2亿元,占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57.91%。^②

这样的宏观统计数据是我们非常需要的,而且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和详细参考。这些数据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近代中国经济大致的动态轮廓。但上述统计中的“新式产业”仅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没有包括进出口商业、国内商业等,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其他产业,似乎又并不完整。

虽然没有把商业资本列入“新式产业”,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对商业资本还是作了估值。正如该书所称,“对于商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我们所作估值更为粗糙”^③,在“资本估值”表中,从1936年资本总额的统计数字看,商业资本50亿元,小于产业资本55.5亿元,更小于金融业资本95.7亿元,应该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因为从上述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的结构看,进出口业一般要占到2/3以上的比例。书中说,对于商业资本的估算,“是以市场上的商品值除以资本周转率4,求得资本量”。^④不知道该书中的商业资本是否已经包括进出口业。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营进出口业的资本与经营国内流通的资本是有分工的,可以分别计算。以1920年为例,该年的进出口总值为13.03亿海关两,约合14.52亿规元两,即19.94亿元;1936年进出口总值折合10.57亿海关两,约合币制改革前的币值16.35亿元。进出口商品值与进出口业资本额之比应该不是1:4,因为远洋贸易的资本周转会慢很多,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行,不知一年是否能够完成两次资金周转。但即便是以只完成一次周转计算,把外贸数字加上,商业资本的估计仍然偏低。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没有把西方寡头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庞大的销售网和销售设施计算进去,这可能是缺乏原始数据或可靠的调查数据;二是没有把大量与进出口业配套的服务业、房地产业、小型非公司制企业统计在内。

除了工业与商业的比重结构之外,工业内部的轻重结构也是重要的度量指标。在一种由外人操控的社会经济形态下,重工业是很难充分发展起来的。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我国东北地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83—85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0页。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730页。

④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732页。

区,为了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的体系,在东北地区投资的重点是重化工业。于是东北的工业结构与关内形成鲜明的反差。1943年东北地区所产的几种重要的工矿产品均占全国相当高的份额:煤炭为253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9.4%;原铁170.2万吨,占全国87.7%;钢材49.5万吨,占全国92.7%;电力设备为2098千基罗瓦特,占全国83.3%;水泥150.3万吨,占全国66.0%;硫酸钡9.2万吨,占全国69.0%;苏打灰5.9万吨,占全国60.0%;机械5.5亿日元,占全国95.0%。^①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和工业结构的落后。

从1935年起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了一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项目投资,但未能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建成投产,战时又受到破坏。刘光第在总结1949年中国工业的结构特征时说:“华东轻工业远比重工业为大,华东轻工业约占全国总生产力70%左右,上海约占华东70%,占全国50%左右。”^②

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一个未经全面转型的社会,政治腐朽,各级政权滥征苛捐杂税,各个地区彼此处于行政性分割状态,科学技术远未普及,受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的人才缺少,这些都是工业薄弱的根本原因。而买办、商人、钱庄主等投资工业,固然体现了其勇于进取的精神,但又难免受其固有弱点的局限,如科技水平低,管理能力差强人意,不太能与外姓人士合作等。这些投资人所熟悉的,除了他们赖以起家的商业和服务业之外,在工业方面大多局限于外商在华棉纺、食品等行业的企业。而外商在华少有高技术、重工业的投资,即使有(如电力),也完全聘用其本国人才担任技术和经营管理要职,中国人很难仿效,加之中国的投资人一般并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这是我们在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规模进行度量时需要认识到的。

罗斯基对叶孔嘉、刘大中、珀金斯、许道夫、王业键、巫宝三、卜凯、黄宗智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和修正,得出了比较完整的全面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宏观数据,是迄今为止国外学者中做得最细致和最完整的,如他所做的全面抗战前中国GDP增长率和指数的经修正过的数据表。^③

罗斯基基本上是用衡量西方国家GDP的方法来衡量近代中国,他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书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是重视工矿交运业,重视货币金融业,而轻视进出口业和商业。在他的研究中,中国似乎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外商和外资的进入只是为了帮助中国的经济进步。他在该书中写道,“一些研究者宣称轻易允许外国商品(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只缴纳象征性的关税)和外国资金(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地投资采矿业和制造业)进入中国,阻碍了中国近代部门的发展,并给工业发展留下了结构和区域不平衡的后遗症。这种认为自由贸易必然阻碍工业化的论点,很难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明治时代的日本和现代香港地区等成功经验相吻合”;“外国企业经常在中国新工业的发源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中国经营者正是从对外国商业模式的观察中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销售机会”。在他看来,外商和外资只是“在中国新工业的发源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④当然,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笔者也承认外商和外资对中国经济有“催化”或示范引领的一面,但决不局限于此。外商和外资最主要的历史作用并不是对中国民族企业的示范引领,而是要把中国经济塑造成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样式,它们并不基于在中国发展制造业及独立的工业链,而是特别注重发展进出口贸易、西方垄断企业的在华销售系统及配套设施。罗斯基的著作在这方面毫无关注,这是由研究理念所造成的空缺。

①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资源及产业》下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129页。

② 刘光第:《解放以来的上海工业》,《经济周报》第10卷第21期,1950年5月,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43页。

③ 托马斯·罗斯基著,唐巧天等译:《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25页。

④ 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第18—19页。

一些学者在基础研究上下了一番功夫。孙毓棠、汪敬虞两位前辈老师对近代中国工矿业新设企业的统计,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欢迎和引用。笔者在两位前辈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新设企业的统计加以扩展,如在对1928—1937年中国新设企业的统计时,把商业、外贸、服务、娱乐、房地产、餐饮等企业纳入统计之中。^①在笔者正在进行的历年外商在华新设企业的统计中,更把进出口洋行作为关注的重点。相信这能使新设企业的统计更加完整,也更加符合历史真实。外商在华新设的工业企业还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从表2中可以看出来。

表2 1840—1937年外商在华新设企业统计

类别		数量	占比(%)
工业		1323	44.79
交通运输业(航运、铁路、航空)		79	2.67
采矿业		101	3.42
进出口业		599	20.28
商业、服务业、码头仓库、房地产业、娱乐业、律师、会计师、公证业		665	22.51
金融业	银行	69	6.33
	保险	63	
	其他金融	55	
	共计	187	
总计		2954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拙编《历年所设外国在华企业一览表(1840—1937年)》(待刊)编制。

说明:1. 本统计不包括港台地区及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地区的新设外商企业,也不包括“两头在外”的外商橡胶园企业。2. 收入本统计的工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企业系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者;金融企业系创办资本在5万元以上者;进出口业及商业服务业等则并无创办资本额统计门槛。3. 各类企业如有分支机构者,不重复计算。4. 对于成立时间很短的进出口商业、服务业等企业不列入统计。

外商新设工业企业虽有一定数量,但英美等国的大企业、大财团都不把工业企业作为在华投资的重点。它们主要投资进出口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各种商业及服务业等。它们投资的工业,常常是因为销售产品的需要而建立的配套设施,如维修、零配件生产等,因而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没有大型设备、机电、重要化工、大型机械、精密仪器、发动机、汽车或重要部件、大型船只、军工等自主型经济增长必需的核心企业,极少较大型的钢铁冶炼企业。英国资本在华“四大支柱”企业是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广东联合保险公司,后起的大财团则有亚细亚石油公司等。这些企业在华投资的重点都不是工业企业。^②美国的在华投资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美国在华专做进出口贸易的商行“分布于中国各大都市,为数甚多,且均资本雄厚,信誉卓著,故能将美货畅销于中国各地。其中如美孚煤油公司,拥有数千万金元(按:即美元)的投资额,在中国各地均有分行或代理点。因而对于油的输入握有绝大势力。他若以输入机器军火等著名的慎昌洋行、以经营木材和轮船著名的大来洋行,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美国商行,均属此类。因为商行的活动和金融机关有密切关系,所以美国的金融机关也密布于中国各都市。如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大通银行、美丰银行、统

^① 杜恂诚:《历年所设本国企业一览表(1928—1937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400页。

^② 森次勤著,张汉译:《在华列强资本研究》,《中国经济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5月,第6页。

一银公司、普益公司等等都是”。^①

上文提及的慎昌洋行成立于1901年^②,1921年时资本500万美元,董事会设在美国纽约,总行设在上海,雇用外员100人、华员1100人,规模很大。^③其在1922年10月2日的《申报》广告上称:该洋行在华销售“全部原动力各式机器、奇异电器材料、工厂一切用件材料、建筑材料、铁路机器材料。以上机器材料,名目繁多,不及枚举。兼营进口及保险事业。凡有关于机器工程等问题,倘蒙就商,无不竭诚欢迎”。广告并列了该行的奉天、天津、北京、济南、太原、汉口、广州、香港8个分行。^④笔者曾系统查阅1911年至1934年慎昌洋行在《申报》上刊登的数量庞大的销售商品广告,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机器、建材和消费品。机器中以纺织、面粉、采矿、发电等机器为主;消费品中前期有奇异等品牌的电扇、电灯泡等,后期则有奇异等品牌的电冰箱、洗衣机、电炉、电熨斗等,甚至还销售过法国八卦牌白兰地酒。^⑤英美烟草公司在华设厂,类似于进口替代的棉纺织工业企业,在华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可以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更有利于刺激消费。而发电量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及1929年收购其资产而成立的上海电力公司,其电力主要支持上海的棉纺织工业及居民消费用电需要,是城市化的产物,并没有起到刺激其他重工业发展的作用。还可以将表2中的1323家外商历年在华所设的工业企业作进一步的分类如下(见表3)。

表3 1840—1937年外商在华新设工业企业分类统计

类型	行业	数量	占比(%)
出口加工	制丝(19家)、制革(41家)、部分食品(65家)	125	9.45
城乡生活	部分食品(156家)、医药(40家)、日用品(44家)、电气(19家)、建筑(48家)、橡胶(18家)、化工(27家)、公用事业(78家)、烟草(54家)、火柴(23家)、杂项(64家)	571	43.16
主要为进口商品流通及售后配套服务	机械冶炼(129家)、建材(74家)	203	15.34
纺织业	棉纺织(72家)、其他纺织(49家)	121	9.15
与航运相关	造船、修船(53家)	53	4.00
与文化相关	造纸(9家)、印刷出版(237家)、部分化工(如油墨、颜料,4家)	250	18.90
共计		1323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拙编《历年所设外国在华企业一览表(1840—1937年)》(待刊)编制。

说明:1. 本统计不包括港台地区及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地区的新设外商企业,也不包括“两头在外”的外商橡胶园企业。2. 收入本统计的企业系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者。

表3显示,这些外商在华新设的工业企业总体上从属于其进出口商品流通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需求,并不能体现工业化基础建设需要及结构提升的趋势。表3中将机械冶炼业企业列在“主要为进口商品流通及售后配套服务”一类,是因为大财团的在华所谓机械工业投资,就是推销商品的配套投资。在机械冶炼业的企业投资中,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大石油巨头等所设的油灯、

① 《美国在华之经济势力》,《中国经济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5月,第7页。

② 关于慎昌洋行的成立年份,有几种说法,本文取1901年的说法。

③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59—360页。

④ 《“美商慎昌洋行”广告》,《申报》,1922年10月2日,第9版。

⑤ 《慎昌洋行“法国八卦牌十五年白兰地”广告》,《申报》,1922年4月11日,第5版。

油罐、油桶制造厂共有9家,福特、通用等汽车巨头所设的汽车零配件制造及修理厂14家,“满铁”等日本国策会社所设铁道车辆器具修配厂11家,以上共34家,再加上为进口替代工业服务的纺织机械修配厂3家,共37家,占了总数129家的28.7%。^①此外,则多为中小型的外商分散投资,涉及锅炉、水泵、水管的修理制造、电焊电镀、建材与家用设备修配、小型机具制造、小型金银铜锡等金属冶炼(金银冶炼多用于首饰)、修配用铸铁件制造、机器修造等,当然有些外商企业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即使有钢铁生产,其产量也一定是很有限的。在当时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钢铁冶炼厂,只有“满铁”控制的鞍山制铁所(1933年改制为昭和制钢所)和大仓财阀控制的本溪湖煤铁公司炼铁厂,只是这两家企业是与日本国内的军事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产品都出口日本。因此,从总体上看,外商在华设立的机械冶炼企业并不能为中国机械和冶炼行业的独立发展及体系提升提供助力,而只是一种销售商品的配套型投资。

基础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审核考订、研究推敲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甚至是毕生精力。史志宏对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对1644—1911年中国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粮食产值以及包括经济作物生产在内的整个种植业的产值和包括农林渔业在内的农业总产值等多项农业生产指标作出量化估计,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清代农业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影响等问题。^②他说,他一生就做了这件事。

总之,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的进出口贸易及相关产业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化。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掘西方财团在华活动的历史档案材料,另一方面要在计量研究方面有进展。如何科学测量进出口贸易及相配套的各种服务业、商业的发展程度并作出恰当评价,以及是否有可能建立衡量指标,是摆在经济史学家面前的课题。

如果以全球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度量如下的一些问题,诸如近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全球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中国的进出口商品对西方国家经济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与其他欠发达国家同时期经济的异同等。这些工作的前提是原始资料的发掘。相信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许多科研条件能够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杨宏)

^① 根据拙编《历年所设外国在华企业一览表(1840—1937年)》(待刊)计算。

^② 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5页。